

我對“一國兩制”淵源的認識

常 樂*

如何認識“一國兩制”這一劃時代的制度安排，如何認識“一國兩制”實踐的長期性、複雜性和艱巨性，以及如何判斷“一國兩制”的未來走勢和未來結局，可以從三個方向來把握。一是要從國際、國內和香港三個視角客觀公正地認識和看待“一國兩制”，二是要從歷史長河和近代社會巨變的角度認識和看待“一國兩制”，三是要從歷史、現實和未來動態、發展地認識和看待“一國兩制”。通過多方位研析“一國兩制”這一前無古人的制度設計和高度濃縮的歷史節點，給我們開啟了洞悉港澳台、中國以及世界相互關係的寶貴鎖鑰。

一、從世界歷史變遷的宏大視角認識和看待“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的精義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國範圍內同時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由於這兩種制度的同源性、鬥爭性、並存性和現代性，都必然要求我們從世界大歷史的角度去認識和把握兩種制度的起源、異同、脈絡與趨勢，瞭解了這一世界歷史發展大勢，則對於中國“一國兩制”戰略決策的出台以及該方針政策的實施，才會有更加堅實的理據、自信和普世意義。

（一）“一國兩制”是近代東西方歷史交匯、文化交融的制度遺產和人類政治生活的結晶

所謂近代社會，就是在全世界範圍內，由西歐率

先而起，經濟領域實行市場經濟，政治領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思想文化領域宣揚信奉自由、平等、博愛、公平、民主、法治的歷史進程。這一進程較之東西方傳統社會，無疑是一場巨大的歷史進步，從此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制度摧枯拉朽，從歐洲向全世界傳播、征服，造成東方從屬於西方的基本格局。

上述是近代社會的主流，或者是近代社會的上層社會面向，在其之下，還掩蔽、壓抑着廣大的底層社會民眾，他們受着本國或多國資本和權貴階級的層層盤剝，生活窘困，民不聊生。由此，近代社會又衍生出批判、反對、敵視以致以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為職志的社會主義思潮。最為標誌的，就是馬克思、恩格斯所宣揚的無產階級是資產階級的掘墓人，並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及其實踐。並且這一理論也是由西歐不斷傳向東方，隨着蘇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在世界範圍內造成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現代性制度並存的局面。從此，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理論與實踐在一國範圍內的鬥爭，就演變和躍升為世界範圍內國與國之以及陣營與陣營之間的鬥爭。並且，這兩個層面的鬥爭並沒有相互代替，而是相互關聯，相互滲透，進一步加劇了國內和國際政治鬥爭的複雜性。

但是無論如何，從世界大歷史的視野去看，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是人類社會的巨大進步，即使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存在不少內在矛盾和缺憾，但它仍然是目前世界上影響最大、運用最廣的一種社會制度。它的自身矛盾以及制度缺憾，通過兩個層面進行彌補，一是世界範圍內的資本和資源流動，二是資本主義體

* 中國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

制內社會主義因素的增長。而處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鏈條上最薄弱環節的國家，則沒有能力實現上述對外和對內兩大範疇當中的革新，因此也只能被社會主義制度所代替。

然而，從世界範圍內國家間的最新實踐看，雖然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總體表現為對立和制衡，但是一方面國家間的合作是大趨勢，另一方面在兩種性質的國家內部，也都在吸收着與自身相異的對方的制度要素。總之，一方面在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在走着合作、共贏的發展道路，另一方面在一國範圍內，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也在相互感染、吸收、甚至同化着對方，只是其表現形式各有不同而已。

這種對立統一關係，充分反映了截至目前人類社會兩大最為優越的社會制度攜手共進的必然性與可能性，以及當前這兩大制度各自都未達致其最佳或最完美程度的現實，因此二者也都不可能完全取締或代替對方，而為了國家或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二者只有攜手並進，共同發展。

具體到中國的“一國兩制”，就是這種世界大歷史的視界及其格局的充分反映，一方面表現為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協同合作的濃縮化和一國化，另一方面表現為一國範圍內社會主義主導地位下的資本主義因素的增長及其制度化。再加上港澳台地區的歷史特殊性，正處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拉鋸、衝突、合作的最前沿，因此在這三地實施“一國兩制”就成為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二）“一國兩制”是冷戰背景下大國博弈和鬥爭的必然產物，也是一種具有遷就、妥協性質的制度諒解

“一國兩制”背後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一方面，正如前述，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旺盛生命力和在中國內部資本主義因素通過改革開放過程的逐步增長，必然讓國家決策者考慮如何處理國家內部特殊地區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問題，另一方面，中國將要實施“一國兩制”的特殊地區——港澳台——所對應的資本主義國家，則是不同歷史時期世界上最為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從資本主義初期的葡

萄牙，到成熟期的大英帝國，到二戰後最為發達的美國，他們在不同時期與中國的接觸、交往以致合作，中國都處於相對弱勢或劣勢的地位。要麼昧於世界時勢，要麼囿於自身實力，中國在與這些世界資本主義強國交往的過程中往往處於被動、妥協、無助的局面之下。當然，這裏的中國還是指的清王朝。

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國的國際地位有所提升，中國在與世界各國的交往中秉持了獨立自主五項基本原則，以往屈辱、不平等的外交關係一去不復返了。由於港澳地區地域逼仄，遠離葡、英，關鍵是葡萄牙和英國國力急劇衰落，因此葡萄牙早想將澳門拱手送還，英國也十分懼怕中國用武力奪回香港。即使在建國初期，中國若想收回港澳，在國際範圍內可能也不會遭到很大的非議和波折。

但是，由於戰後世界範圍內形成了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和以蘇聯為首的“華約”兩大敵對陣營，且兩大陣營長期處於“冷戰”對峙之中，新中國雖然加入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但是美國通過聯合國糾集多國對中國進行封鎖和圍剿，發動朝鮮戰爭，給新中國政權的穩定及一窮二白的國家發展帶來巨大阻力。中國為了打破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長期經濟封鎖，保持賺取外匯和與西方聯繫的通道，因此制定讓港澳地區維持現狀，以實現“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戰略意圖。

朝鮮戰事結束之後，社會主義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最容易衝突及引發戰爭的地區，不是港澳，而是台灣。一方面，在蔣介石政權敗退台灣的二十餘年間，一直抱有“反攻大陸”的野心，並且在東南沿海不斷發動零星和小規模的軍事衝突，而其背後，則有美國在資本、武器、人員等方面的堅定支持。而另一方面，新中國當然有收復台灣、統一全國的堅強意志和決心，但是囿於國力、武器，尤其是美國的插手和干預，這一願望遲遲難以實現。但是台灣當局和社會主義中國之間的這種動態鬥爭與軍事對峙局面，牽扯了美國太多精力，因此也不是它所願意看到的。美國也想找到一個既能制衡台灣和大陸，使其處於和平狀態，又能保持其在遠東地區的戰略超然地位的辦法。

中美在解決台灣問題的道路中，蘇聯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角色。在新中國成立後的中蘇同盟的蜜月

期，美國與中蘇兩國都處於敵對狀態。這時美國指示台灣在兩岸關係上千萬不能輕舉妄動，其邏輯是：如果台灣反攻大陸的動靜過大，中國將會全力以赴，美國因是台灣的軍事盟友必然要幫助台灣，而蘇聯作為中國的盟友也會加入戰團幫助中國。因此，中蘇聯手武力對抗美國，則是美國最不願意看到的結果。

而到了上世紀 60 年代之後，由於中蘇關係破裂，美國就逐步改變對華政策，準備聯手中國以制衡蘇聯。因此，中美建交提上日程，而橫互在兩國之間的最為重要的台灣問題就必須先期解決。經過長期的談判和博弈，中美在台灣問題上取得兩點基本共識：一是台灣屬於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二是中國政府承諾和平收回台灣(不承諾放棄武力)，台灣未回歸前兩岸保持均勢狀態。隨之於 1979 年中美正式建交，同時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提出和平統一的概念，接着在 1981 年全國人大委員長葉劍英提出對台灣的 9 條政策，至此，“一國兩制”雛形顯現。

綜上可知，“一國兩制”的出台，一方面是世界歷史大勢的呼喚，另一方面也是戰後“冷戰”時期中美蘇三大國鬥爭博弈的結果。正是基於中美蘇三國現實鬥爭以及國家利益的考慮，中美建交一方面順應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另一方面也更符合中國走出“文革”、走向世界、民族振興的國家利益。在這一大局下，對於台灣這一特殊地區，中國政府承諾和平統一，並且統一後台灣仍可保留其原有社會、經濟制度，已經是對美國的較為重大的妥協和讓步了。但是“一國兩制”在港澳的實踐已經表明，“一國兩制”既符合世界範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合作、協同趨勢，也符合港澳台地區的特殊歷史背景，因此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這已足以寬慰作出這一歷史創舉的先輩們的良苦用心了。

二、從百多年的中國歷史認識和看待 “一國兩制”

近代中國一百多年來的歷史，一方面是衰落史和

屈辱史，另一方面則是獨立史和振興史，在這一較長的歷史過程中間，中國命運的起落沉浮，與世界上一系列資本主義國家，以及資本主義制度和文明息息相關，而其間，港澳台等地區作為中國的一部分，也具有了相似的歷史命運。但是，由於港澳台地區的特殊歷史經歷，反過來又對百多年中國歷史的發展變遷在不同時期發揮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因此，百多年來兩岸四地的互動歷史過程，又是一個考察和認識“一國兩制”的重要視角。

(一) 和平統一的制度安排

從香港的角度看中國百多年的歷史發展進程，真像一個歷史週期的輪迴。中國從傳統進入近代這一“千年未有之變局”，就是起於中英鴉片戰爭，起於香港島被割讓給英國，起於國家領土的分崩離析。而新中國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階段，進入改革開放加速發展的最佳歷史時期，也是大致開啟於祖國統一大業的重大突破，伴隨着“一國兩制”國策的制定，相繼迎來香港和澳門的回歸祖國。

中國進入近代社會以後面臨的最大歷史任務就是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以及在此基礎之上的國家振興和民族富強，前者是後者的條件與基礎。從歷史回溯，晚清政府除了割地賠款，對這一歷史使命已經無能為力。而中華民國的北京政府及南京政府，不可否認，在這方面作了其力所能及的努力，也收穫了來之不易的成果。進一步走入歷史深處看，在這些成果背後又會發現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種價值、兩類制度、兩個政黨的既鬥爭又合作的場景與畫面。

北洋政府時期，中國四分五裂，列強分而治之。以社會主義為理想的中國共產黨和以資本主義為追求的中國國民黨在 1924 年之後實現了第一次合作，推翻了北洋政府，至少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對於中國統一和領土完整這一歷史任務，邁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而這一成績的取得，奠基於國共兩黨的聯合努力。隨後發生的日本侵略，使中國處於亡國滅種的邊緣，還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的聯合抗日，更是取得了一百多年來中國抗擊外來侵略第一次偉大勝利，捍衛了國家的主權和尊嚴。這一近代重要歷史任務的完成以及偉大成績的取得，還是奠基於國共兩黨

的共同努力。

從一定程度講，國共兩黨代表了中國內部的兩股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力量，也代表了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間的資源和利益。因此可以推論，國共兩黨的兩次合作，就是中國範圍內兩次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股力量的合作，並且都形成了國家進步的動力，也取得了偉大的歷史成就，實現了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所追求的國家的統一、領土的完整和主權的獨立。這時中國近代歷史給我們的重要啟示，也是距離我們最近的十分重要的歷史經驗。

經歷國兩次國共合作，體會到這一重要歷史經驗的新中國的領導人，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重新面臨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這一中國近代所不斷追求的重大歷史任務和歷史使命的時候，個人(也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這一群體)的經歷和經驗在其決策時就會佔據重要地位，不論國共是否出現第三次合作，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制度的攜手合力，對於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這一歷史任務的最終完成，將會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的一種最佳制度選擇、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於是，“一國兩制”應運而生；於是，香港、澳門和平回歸。

(二) 改革開放的資源整合

中國近代社會的另一重大歷史任務，就是國家復興和民族富強。如何才能實現這一偉大歷史進程呢？正如前述，首先要實現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這時國家復興和民族富強的前提與條件。並且這一歷史任務，可以憑藉“一國兩制”這一制度創舉來完成。其實，“一國兩制”之所以成為改革開放之後的基本國策和偉大制度創舉，還有實現改革開放後進行國內外資源整合，推動經濟快速發展地深層戰略考慮。

國家通過“一國兩制”這一制度安排來進行資源整合，其精義就是要實現國家和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制度體系內的優勢資源的整合。這一資源整合過程包含三個層面。

一是市場經濟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的借鑒與整合。“一國兩制”剛開始提出之時，港澳台及國外主要發達國家，基本都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由於這些國家和地區大都奉行資本主義制度，以至於傳統社會主

義理論和蘇、中社會主義實踐都將市場經濟排除在外，認為這一體制具有資本主義性質，在本質上與社會主義制度相衝突。但是社會主義實踐的困境，生產關係的束縛和生產力發展的滯後，都指向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陳舊與內在缺陷。因此中國的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面向，就是從舊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於是，“一國兩制”制度的開啟和推進，以及港澳台商到內地的投資開工廠、獨資合資，成為推動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完善，並最終成為資源配置最主要手段的重要制度安排。

二是港澳台的資本、技術、人才、項目資源和內地龐大的市場、勞動力資源的有機整合。二戰後，港台等地區承接世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產業轉移，經濟飛速發展，積累了較多的資本、技術和人才，但是由於其人力、市場和資源十分有限，發展遇到瓶頸，隨着國內改革開放進程的開啟，尤其是專門針對這些地區的“一國兩制”制度設計的出台，對他們是一個巨大的吸引。因此，改革開放以及港澳回歸以來的實踐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至今中國持有的境外投資數量，港澳台資本仍佔絕大比重，反之，港澳台商也從中獲取了巨額利潤。通過“一國兩制”這一制度安排，兩岸四地實現了共同發展，大大推動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

三是港澳台地區帶動和牽引了越來越多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技術、人才和項目進入中國，進一步推高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水平和中國融入世界廣度與深度。由於歷史原因，以及港澳台三地較早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因此它們與國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聯繫十分緊密，許多外國資本在三地都有投資。近年來香港提出充當世界與中國的“超級連絡人”角色，澳門定位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平台，都充分反映了它們作為世界與中國聯繫交往中的仲介角色和地位。

(三) 治國理政的體制助力

世界範圍內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並存，其異質性和鬥爭性雖然是隱性的，但卻是主要的，然而這又給雙方不斷完善自身理論和制度提高了警惕和動力。中國領導人的治國理政心態則更為開放，竟然將

異質性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直接引入到國家體制的內部，建立“一國兩制”基本國策，實施一系列“一國兩制”性質的方針政策，這對於社會主義中國處理內外資本主義問題既提供了直接經驗和借鑒，也增強了處理和駕馭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複雜問題的能力，這對於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都大有裨益。

首先，港澳台具有相對發達、完備的城市治理政策體系和現代治理技藝。總體而言，港澳台地區較之內地先行一步，尤其是它們大多經歷過與西方發達國家高度融合的歷史階段，從而將西方先進的管理制度與中國傳統優秀的治理文化相結合，在“一國兩制”制度安排下，這些融合中西的寶貴的治理理念、制度和技藝，都很值得內地學習和借鑒。擇其要者，有法治、教育、醫療、交通、文化保育、社會服務等領域。

其次，港澳台地區所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大大推高了治國理政的複雜性和艱巨性。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以及十七大以來，中央都將港澳地區“一國兩制”實踐中所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特點，視為治國理政當中的嶄新課題和重大課題，必須要高度重視和嚴肅對待。近年來香港特區所出現的政改及普選問題，“23條立法”問題，國民教育問題，“佔中”問題，以及新近冒起的激進本土勢力等，都干擾到香港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背離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一國兩制”宗旨，給中央的治國理政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任務。

最後，港澳台地區實行“一國兩制”，大大拉近了中國與世界上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距離，將之前相對隱性的矛盾和衝突顯性化、公開化，給中國處理國際事務帶來了一定程度上的挑戰。從“一國兩制”的提出和實踐來看，世界範圍內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港澳台地區的角色和作用，存在着兩個截然相反的特點，一是“一國兩制”制定時的“濃縮效應”，世界資本主義都濃縮到具體的一個當事國，只有它才有資格與中國談判、博弈；二是“一國兩制”實施時的“放大效應”，當港澳台地區發生一些與內地有關的事件，美國、英國、德國、日本、歐盟甚至一些資本主義的小國也會發聲，集體性干預中國內政。

另外，港澳台地區在實施“一國兩制”的進程中，還存在一個“前置效應”，也就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為了繼續維持其在台灣的利益，故意給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製造更多的衝突和障礙，一方面可以為台灣的“一國兩制”爭取更大的制度優惠空間，另一方面甚至幻想“一國兩制”在困難面前難以為繼，以致消亡，最終讓台灣保持現狀。然而，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兩面性。“一國兩制”實踐中暫時遇到的困難，一方面會進一步推動提高中央的治國理政能力，另一方面國家也可以借着處理港澳地區“一國兩制”實踐中的複雜問題，進而考慮一攬子謀劃和制定新的國際經濟政治的治理體系和秩序，從而真正擔當起一個世界大國的責任和義務。從這一角度看，此舉又可謂“一國兩制”的外向翻轉和另一版本了。

三、從香港百餘年的歷史看“一國兩制”

香港經歷了一百多年的英國殖民統治，期間，廣大港人殷切期盼甚麼，追求甚麼；廣大港人努力奮鬥，創造了哪些成果和優勢，這些內容與“一國兩制”到底是甚麼關係？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分析。

(一) 解決身份歸屬

在一百多年的歷史中，港人經歷了被英國佔領、租借和被清政府拋棄的歷史命運。尤其在英國殖民統治下，英華分治，華人作為二等公民，無權參與政治，社會生活層面也諸多受限。於是，香港就像漂浮在太平洋上的一艘船，對於英國而言，是借來的地方；對於中國人而言，也像借來的地方，僅作為短期謀生之地或臨時逃難之地，為了金錢、為了生命而隱忍了家國和身份的敘事。

但是在緊要關頭，港人的民族認同、國家認同、身份認同又會蓬勃而出。譬如抗戰時期的為國效命，重大自然災害時期的為國捐輸，還有日常涓涓細流般地周濟內地親族，然而這些都是時代潮流和文化心理在起作用，而其港英治下的實際身份則顯得相當模糊。從而在較長時間裡，港人形成了對國家民族愛恨交織、親疏並存的矛盾心態，甚至不少人還有意無意

地淡化了自己的身份屬性。

“一國兩制”的提出和實踐，尤其是《香港基本法》的實施，最終從國家主權和法律的角度釐定了廣大港人的身份問題。飄零的小船終於駛回了港灣，回到了祖國母親的懷抱。港澳基本法是“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法律化和具體化。港澳基本法序言首先指出了這一政治和法律事實，就是港澳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通過中英、中葡聯合聲明，確認中國於 1997 年和 1999 年恢復對港澳行使主權，從而實現了長期以來中國人民收回香港的共同願望。

中國恢復對港澳行使主權後，港澳同胞自然成為中國公民，其身份屬性也可通過法律程序予以確認。身份歸屬問題解決以後，隨之而來又產生身份認同亦即國家認同問題。歷史往往產生詭異的悖論，兩地隔絕時有認同和回歸的訴求，兩地統一後又有了排斥和分離的傾向。香港回歸前後三十多年正在走入這個歷史怪圈。香港社會現實已清楚表明，正是香港境內外資本主義勢力的滲透、聯合與推動，才使得它陷入這個怪圈，目前還有惡化的趨勢。這當然需要中央和特區政府採取更為妥當、周全、堅定的措施予以化解。

但是也可考慮從另一方面開展工作，即通過制度化、人性化的政策手段，來逐漸淡化兩地國人的身份分野，最終定格在中國公民的身份和角色。首先，應在國家層面對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內的中國公民，施以相同的權利和義務。只不過，這一相同的權利和義務，要在內地來呈現出來。其次，在港澳台地區內部的中國公民，可以享受其基本法內所規定的相對特殊的權利和義務，這些權利和義務既不涉及內地中國公民，也不越出三個特別行政區。最後，當前應考慮從制度上保障港澳與內地的中國公民享有相對自由、便利的身份相互轉換權利。

（二）踏上民主進程

港英統治的一百多年間，華人沒有民主，或者說沒有享受到真正的和適切的民主。有人會問，從上世紀 80 年代開始，港英政府不是放開了區議會、立法會的選舉了嗎？怎麼會沒有民主呢？這就涉及一個真假民主的問題。

香港上世紀 80 年代開始的快速民主化進程，明

顯是在 70 年代末港督麥理浩訪京之後，其加快的步驟也都伴隨中英聯合聲明的發表、《香港基本法》的頒佈等等重要歷史節點，這就一再證明了英國快速推進香港的民主化，暴露出其管治的策略性和虛偽性。一方面英國想籠絡討好香港民眾，給港人留下良好的“英國記憶”；另一方面給回歸後《香港基本法》的貫徹實施製造障礙，破壞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這兩方面都會在一定程度上讓英國的角色“回歸”，插手香港事務，延續其固有利益。很顯然，回歸後及目前香港民主發展進程中的諸多亂象，都與港英先前的佈局有關。因此實質而言，這樣的民主就是虛偽的民主，也不是適切的民主，不要也罷。

反觀回歸以來，香港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循序漸進發展民主也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績。主要有四點表現：一是立法會議席不斷增加，直選成分不斷擴大；二是區議會委任議席取消；三是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數量不斷增加，行政長官的代表性不斷增強；四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雙普選”的法定目標出現清晰的時間表和路線圖。

然而，由於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的故意阻撓，廣大市民普遍期望的行政長官普選方案功敗垂成。這從另一方面也說明香港目前開展“雙普選”的條件還不成熟，港人在相關議題上還沒有形成共識。這又引出一個問題，即民主的邊界問題，也就是香港到底要追求一個甚麼樣的民主，怎麼才能實現這樣的民主。

其實對於這些問題，《香港基本法》已有十分明確的規定，只是一些人故意扭曲和拋開基本法，從而給香港的民主法治製造了不和諧聲音，甚至阻礙了民主發展進程。民主的邊界應該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外在邏輯邊界，即民主普選的實現條件問題；二是內在內容邊界，即民主普選的實質內容問題。

對於前一問題，《香港基本法》的邏輯脈絡已經說明和解決了，回歸後的“一國兩制”實踐也是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貫徹實施的，只是結果不如人意。《香港基本法》是按照序言、總則、中央與特區關係、居民權利和義務、政治體制等內容的重要程度依次排列，其實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相關法律規定內容實施的先後邏輯順序，前者往往是後者實施的條件。《香港基本法》第四章政治體制部分明確規定了

行政長官的普選問題，但該條款的實行，必須有賴於第二章中央與特別行政區關係部分中《香港基本法》第 23 條的實現。正如前述，在香港內外資本主義滲透、聯合的大格局下，中央如何保證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怎樣保證具有貫徹落實基本法責任的行政長官必須是中央信任的人士，這些都需要第 23 條立法的完成。它是《香港基本法》第 45 條實現的邏輯和實踐前提。這就是香港“雙普選”實現的外在邏輯邊界。

對於後一問題，《香港基本法》也有十分清晰的規定，就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都要“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這一原則而規定。所謂香港的“實際情況”，就是香港的特殊性，就沒有反對派們所一再發力和炒作的所謂“國際標準”，而他們執着此途就是南轅北轍、竹籃打水。甚麼才是香港“雙普選”所遵循的“實際情況”，核心的就是一條，即“均衡參與”。

在行政長官普選中所遵循和貫徹的“均衡參與”，就是要保證社會各界均衡參與所選出的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這樣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才能行使其實質性提名權力。經其提名後一人一票所選出的行政長官也就更具代表性，更有認受性，就會獲得中央和香港市民的雙向支持。

在立法會普選中所遵循和貫徹的“均衡參與”，就是要長期堅持和堅決執行的功能界別選舉制度。隨之而來，有人又會提出功能界別內部是否也要遵循循序漸進擴大民主成分，以及功能界別如何對接普選的問題。這又是一個次生問題，只有在《香港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完成，行政長官普選實現，討論這個問題才有現實意義，也才有解決的辦法。而在此前，則要對相關選舉制度予以固定，以保證選舉制度的嚴肅性、穩定性，減少社會的爭議和紛亂。

(三) 發揮獨特優勢

長期以來，香港發展成為世界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是中國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澳門、台灣也同樣具有十分獨特的優勢。港澳回歸後，國家通過基本法以法律形式將港澳社會創造和積澱的優秀成果

延續、固定下來，使它們在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繼續發揮獨特作用。2016年5月1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張德江委員長在香港出席“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時發表演講，對香港的獨特優勢作了權威系統的表述，指出香港具有區位優勢、開放合作的先發優勢、服務業專業化優勢和文脈相承的人文優勢。這些優勢都非一朝一夕形成的，都是從開埠以及回歸以來廣大港人努力創造的結果。

張德江委員長還指出，中國中央政府高度重視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在國家戰略大局中的作用，支持香港鞏固既有優勢、開發新優勢，支持香港加強與內地的交流合作，支持香港拓展國際經貿聯繫。同時，香港也要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到國家發展戰略中來。希望香港以更寬廣的視野和胸懷，充分把握“一帶一路”建設重大機遇，將自身發展與“一帶一路”建設有機結合起來，進一步放大和提升香港的優勢。

澳門同樣靠長期積累形成了自己的獨特優勢，回歸以後優勢則更加明顯突出。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6年10月11日出席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第五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並作主旨演講時指出，澳門還有一座更長的“跨洋大橋”，那就是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它以語言文化為紐帶、以經貿合作為主題、以共同發展為目標，充分發揮澳門的獨特優勢和平台作用，對推動中國與7個葡語國家加強聯繫已經並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

李克強總理指出，我們要發揮並進一步提升澳門的平台作用。澳門擁有獨特的中葡雙語優勢、優越的地理位置、完善的基礎設施、良好的商業環境，是聯繫中國與葡語國家的一條十分重要的紐帶。中國政府全力支援澳門發揮好“一帶一路”支點作用，加快建設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進一步建設好經貿合作會展中心、中小企業商貿服務中心、葡語國家商品集散中心。

因此可以相信，在港澳同胞的努力拼搏下，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港澳地區的原有優勢會得到進一步鞏固，並能創造出新的優勢，在國家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也能夠發揮出更大的作用，“一國兩制”在港澳的實踐也會更加成功。